

丁日昌與近代中國

主編
丁新豹
周佳榮
麥勁生

中華書局

丁日昌，近代中國洋務運動重要官員和改革家

協助李鴻章辦理洋務，與李鴻章、沈葆楨並稱「北洋三傑」。

官至江蘇巡撫、福建巡撫，加總督銜，會辦南洋海防，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從籌設江南製造局、倡議成立北洋水師、遣派幼童赴美、倡建招商局，到經營台灣、調停教案，洋務運動幾乎沒有一項不與丁日昌有關。

丁日昌 與近代中國

丁新豹

周佳榮

麥勁生

主編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黎彩玉
□ 裝幀設計：李婧琳

丁日昌與近代中國

□
編者

丁新豹 周佳榮 麥勁生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6 室
電話：(852) 2525 0102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 新藝工業大廈 6 樓 G、H 座

□
版次

2011 年 10 月初版

© 201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特 16 開 (223 mm × 160 mm)

□
ISBN : 978-962-8931-28-6

丁新豹 序

踏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國力日盛，幾可與歐美諸國比肩；去年（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規模輝煌盛大，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回顧歷史，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積弱百多載，如今重新崛起，乃數代人發憤圖強的成果。若論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開端，不能不從洋務運動說起；它雖然沒有像日本明治維新般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效，但最終奠下了中國現代化工業的根基。不可不知，浦西的世博園正興築於江南造船廠的原址之上，而江南造船廠的前身是晚清洋務運動的其中一個重點項目——中國首間兵工廠——江南製造局！浦西的世博園址是中國百年以來自強不息、抖擻振作的歷史見證。明乎此，對上海世博自有深一層的感受。

江南製造局的倡建者是李鴻章，但實際負責籌建及首任總辦是丁日昌。他購入了美商旗記鐵廠，作為建立機器廠的基礎，還親自擬訂了製造局的開辦章程，又推薦容閔赴美採購機器，招聘技師，為江南製造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芸芸洋務運動的主理人物之中，丁日昌是被忽略的一個，實際計算起來，從籌設江南製造局、倡議成立北洋水師、遣派幼童赴美、倡建招商局，到經營台灣、調停教案，洋務運動幾乎沒有一項不與丁日昌有關，難怪時人李鴻章及王韜等對他的評價如此之高。

近年從事東華三院的研究，又發現丁日昌晚年在福建巡撫的崗位上退下來在揭陽養病時，受李鴻章之託，投入了中國近代史上其中一次最嚴重的天災——丁戊奇荒的賑濟工作，丁氏利用其在廣東，尤其

在潮汕一帶的威信及人脈關係，通過東華醫院的網絡，在香港及南洋籌募善款，成績斐然。雖養病在家，仍心繫家國，貢獻一己之力。

歷來對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以至沈葆楨、郭嵩燾等洋務運動有關人物的研究，或褒或貶，大不乏人；惟獨對此位對同、光時期的吏治、鹽政、外事、教育及軍事等多方面建樹良多，被視為洋務三傑之一的丁日昌，認識者固不多，遑論研究。2008年杪，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與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合辦了丁日昌與近代中國研討會，參與者均為香港學者，共提交了十五篇論文，取得不俗的成果，經商議決定結集付梓，以彌補此方面研究之不足。2009年揭陽市丁日昌紀念館出版了丁氏的《百蘭山館政書》，亦豐富了丁氏研究的原始資料。

但願《丁日昌與近代中國》論文集的出版，有助加強國人對丁日昌之認識及推動進一步的研究。

2011年1月

周佳榮 序

丁日昌是近代中國洋務運動時期的官員和改革家，協助李鴻章辦理洋務，官至江蘇巡撫、福建巡撫，加總督銜，會辦南洋海防，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於政治、軍事、實業之外，丁日昌亦重視文化，購報譯書，力求新政，廣設義學；他個人又喜藏書，搜購書籍多至十餘萬卷，是清末著名的藏書家，輯有《持靜齋書目》。已刊著作包括《撫吳公牘》、《丁禹生政書》及《百蘭山館政書》，另有《百蘭山館藏帖》、《百蘭山館古今體詩》、《百將圖傳》等。

近刊趙春晨編《丁日昌集》上、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是「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業刊」的一種，收錄了丁日昌的奏稿、公牘、書信、文錄、詩詞、聯語、專著，附錄傳記資料、著作序跋資料和生平大事年表，已具備丁日昌全集的規模，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然而，由於洋務運動時期枝枝葉葉的改革未能即時立竿見影，救中國於危難之中，其後且遭甲午之敗；變法驟興，復為政變摧毀，庚子八國聯軍入京之役，清廷幾近淪亡。長期以來，學界對洋務運動的評價不高，甚至多所非議，以致洋務時期重要人物的事蹟和貢獻未能得到公允的論述。李鴻章、沈葆楨、丁日昌並稱「北洋三傑」，有關他們的研究，近年才逐漸有所改觀，但學界的焦點仍集中在李鴻章一人身上，沈葆楨和丁日昌等洋務大員，並未受到適當的注意。

據我所知，1986年10月，廣東歷史學會與廣東省豐順縣政協在廣州聯合召開「丁日昌學術討論會」，是學界首次舉辦的丁日昌研

討會，部分學者於會上發表的論文，收入張磊主編《丁日昌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同年出版的著作，還有江村編著《丁日昌生平活動大事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和鄧亦兵著《丁日昌評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學界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在此之前，關於丁日昌的專著只有兩種，一是呂實強著《丁日昌與自強運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一是英文的《丁日昌與同治年間的江蘇吏治改革》（Ocko Jonathan K., *Bureaucratic Reform in Provincial China: Ting Jih-ch'ang in Restoration Kiangsu, 1867-1870*.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99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的丁日昌研究有較大進展，高強著《丁日昌外傳》（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趙春晨著《晚清洋務巨擘——丁日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是傳記類，孫淑彥著《丁日昌先生年譜》（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採錄資料甚豐，為丁日昌研究奠定了紮實根基；接着，又有趙春晨著《晚清洋務活動家：丁日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和黃贊發、陳琳藩著《丁日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日本學者著《清朝・大官之幻影——李鴻章與丁日昌》（若尾正昭《清朝・大官の幻影——李鴻章と丁日昌》，東京：透土社，1997年），詳細記述了二人的關係。

2008年12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與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合辦「丁日昌與近代中國」研討會，有十多位學者提交論文，就丁日昌的生平、思想、事業、交友、藏書和著譯等多個方面作了論述，尤為可喜的，是分別探討了丁氏在江蘇省的政績及他與潮州、香港、台灣幾個地方的關係。本書就是這次研討會的論文結集，按照主題大致分為三輯，並附錄「丁日昌與近代中國」研討會紀要及丁日昌研究書目提要，

大抵反映了香港學界對丁日昌研究所作出的努力。

「丁日昌與近代中國」研討會舉辦時，我仍擔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之職；2009年9月起，系務由麥勁生教授接掌，我則專注於教學與研究工作，兼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統籌這本論文集的編務，是我卸下系務重擔後的工作之一，希望香港學界添此果實，可以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多盡一分力。隨着丁日昌著作的系統整理和相關文獻資料的公開披露，尤盼丁日昌研究在不久的將來再創高峰。

2010年12月8日

於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

麥勁生 序

早於 1960 年代，現代化理論風行一時之際，社會學家就特別留意到社會精英的取態，足以決定現代化的成敗。事實上，無論社會如何開放，制度如何民主，關鍵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資源仍由少數人把持，他們順理成章佔據了有限的公共職務，決定重大的公眾議題，積極參與地方事務。他們的行為和風尚，甚至成為大家仿效的對象。中古時代的貴族和近代的中產階級都是很好的代表。可以說，社會精英的一舉一動，足以影響社會發展的進程。尤其在巨變的時刻，就如西方的法國大革命和英國議會改革、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近代史的改革與革命等等，精英羣的選擇甚至關係到上述國家的存亡與命運。

當然，精英羣從來都不是單一的（homogeneous），而是複合的。縱然同屬既得利益者以至管治階層，他們的利益並非完全一致，他們的眼界、識見和價值觀也因教育、職業和經歷等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北宋范仲淹的改革引起的波瀾，不但源於權力鬥爭，也來自士大夫對傳統和規章制度的不同理解。在一次大戰時期，德國的重工業家大發軍火財，對戰爭表示支持，但深受緊縮政策之苦的日用品生產商卻希望和平趕快來臨。在經濟和社會轉化之時，具備新品質的各式新精英應運而生，無可避免與既存的精英產生矛盾。他們對時局有不同見解，亦力圖保護自身的利益。在角力中部分人由始到終堅持己見，站穩立場，也有人尋求折衷，試圖調適。最終的勝方，有機會大展拳腳，因應自己的想法重構社會。失敗的一方，往往被扣上「保守」、「反動」、「激進」、「冒險主義」的帽子。從中國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改

革與革命中，我們同樣看到不同的社會精英的誕生與起落，以及他們對時代的回應與種種功過。

本論文集的主角丁日昌，是洋務運動的重要推行者。他的背景，揉合了時代的各種大小因素。他自小受舊式教育，有學而優則仕的理想，並且在出任地方小官時積累了相當的行政經驗，瞭解到存在於晚清社會的隱憂。從地方小官轉任李鴻章幕僚後，丁日昌有緣見識到西方在經濟、軍事和科技上的力量，也瞭解當中不少可用於改革中國。基於個人的性格和對傳統的熱愛，丁日昌選擇性接受西學和有原則地與洋人合作，以求推行有限度的改革。靠着務實果斷的作風，他在之後管治的上海以至台灣，一路引進各種改革。在去除陋俗、重興文教方面，他亦頗有成績；另外，他在各地也為洋務運動奠下了相當的基礎。但他在鹽政、吏治和治安方面的改革，卻得不到正本清源之效，甚至可說不利中國長遠發展。平心而論，作為一個舊時代的讀書人，他可算能夠積極回應新時代的挑戰，而且為晚清中國的改革作出相當的貢獻。有歷史家甚至把他和李鴻章、曾國藩等相提並論。可惜，丁日昌官位一直在李、曾之下，且不斷受李調度，未能盡展所長，功績也因此遠不如其他洋務要員顯眼。可幸近年在洋務運動、晚清中國和區域發展等方面的研究越見成熟，連帶丁日昌的功過也獲得更全面的探討。年來有關丁日昌的一手材料也大量出版，有利大家進一步認識丁日昌其人、其時代和其行誼。為此，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與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於2008年12月舉辦「丁日昌與近代中國」研討會，邀得多位在這課題有心得的學者發表論文，並收集於本冊。希望本冊能延續大家在這方面的研究興趣。

2010年11月29日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目 錄

丁新豹 序	I
周佳榮 序	III
麥勁生 序	VI

第一輯 務實政事

改革時代的務實主義者——論丁日昌的政治性格和文化取向	麥勁生 3
佐主為治——丁日昌 1843 年至 1864 年的在幕生涯	布琮任 17
丁日昌與晚清兩淮鹽政	卜永堅 37
太平天國後江蘇省縣級行政危機——以阜寧縣為例	張瑞威 46
江蘇巡撫時期的丁日昌	丁 潔 65

第二輯 思恩報國

志繫行芳報國恩——丁日昌與何紹基交遊和創建絜園經過	周佳榮 76
丁日昌與王韜之洋務思想——以海防建設觀為中心	林啟彥 85
光緒初年之晉省賑捐——丁日昌與潮州地方社會的關係	馬木池 101
丁日昌與香港	林國輝 120
內地化與近代化——清季丁日昌與臺灣新政之論述	李金強 黃嘉康 145

第三輯 文教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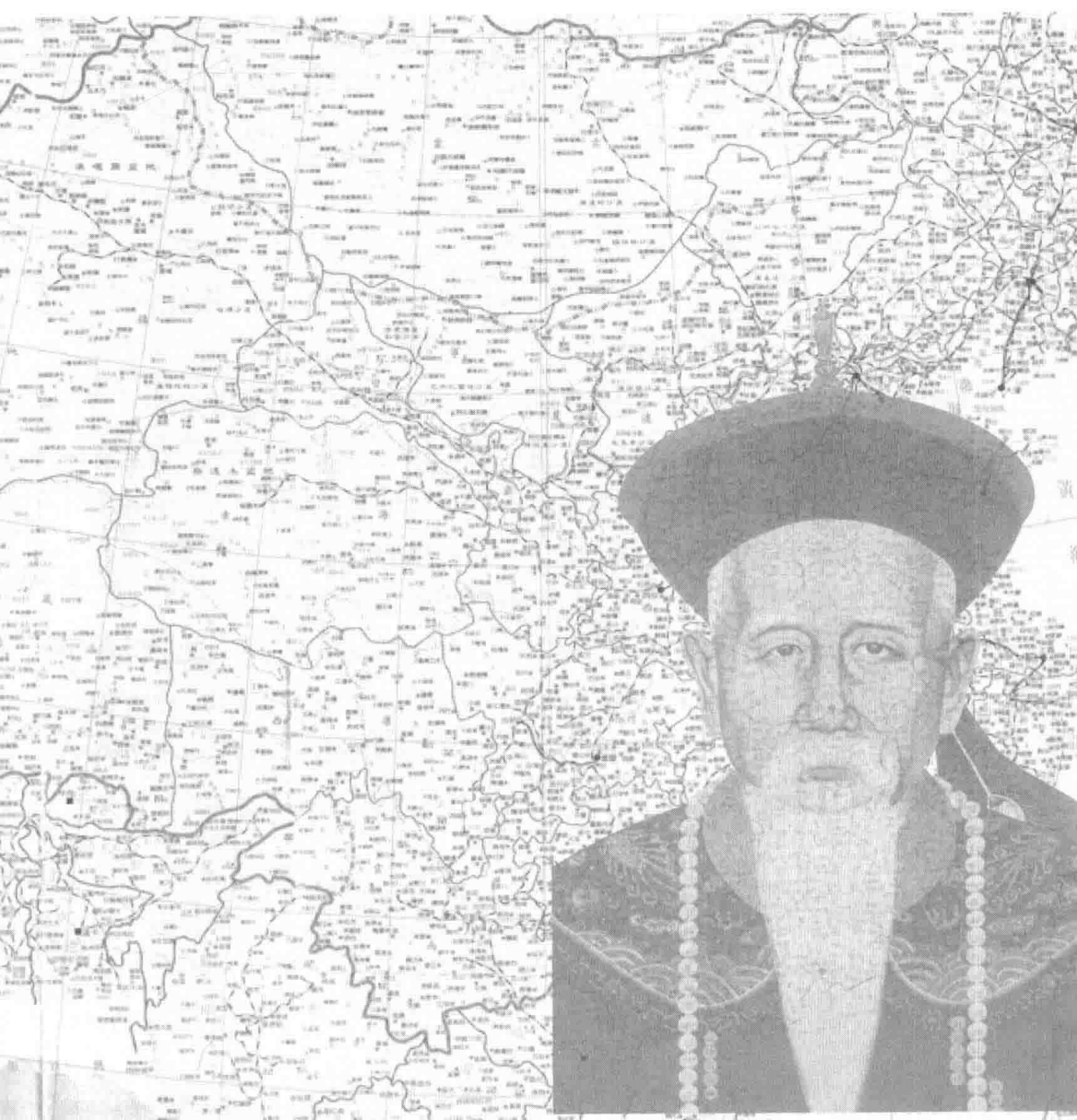
丁日昌的藏書、著書、編書與禁書	胡志偉	162
《火器略說》與晚清軍事工業	葉深銘	175
丁日昌督譯《柬埔寨以北探路記》之研究	區顯鋒	195
選擇的記憶——以丁新民編《濟陽世澤：附丁氏族譜》為例	蔡志祥	211
丁日昌研究述評	劉智鵬 劉蜀永	223

附錄

附錄 1：丁日昌研究書目提要	文兆堅	233
附錄 2：照我寸心千古赤——丁日昌與近代中國研討會紀要	侯勵英	244

編著者簡介	252
-------	-----

第一輯 務實政事



改革時代的務實主義者

——論丁日昌的政治性格和文化取向

麥勁生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一、引論

長久以來，對丁日昌的研究一直受到兩個觀念的主導，其一為階級觀，其二為進步觀。就如夏東林教授指出，在整個五十和六十年代，內地學術受「左傾」思想影響，「對洋務運動是否定的，所以對於丁日昌也是持否定的評價，常常以當時反對他的頑固派所咒罵的『丁鬼奴』一詞加之。」¹因為洋務運動被視為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丁日昌作為洋務運動的健將，顯然是為地主階級效命，他的所作所為亦被當作有礙歷史進步的反動措施。隨着中國走向開放改革，意識形態控制有所舒緩，國內學者亦較能全面地評價丁日昌的功過。在八十年代後期，肯定洋務運動的價值和歷史意義者增多，連帶丁日昌的地位也獲得重新評估。²縱然丁日昌在學者心

1 夏東元〈丁日昌與洋務運動簡介——在丁日昌學術討論會閉幕式上的講話〉，載張磊編《丁日昌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頁14。

2 漆俠編《中國改革通史·近代卷——救亡圖存的近代化改革過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136。

中，仍然是封建統治集團的成員，但他在江西、上海、臺灣等地的改革實績，亦漸漸受到認可。³ 今天中國學界已進一步開放，從年前初版趙春晨著《晚清洋務活動家丁日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所見，階級觀點已淡出丁日昌研究。丁日昌在同治、咸豐年間的鹽運、吏治和軍事改革，更能得到客觀檢視。

另外，學者過往亦常常批評丁日昌的改革欠缺突破性和進步性。《丁禹生政書》〈代序〉作者范海泉和劉治安認為丁日昌和其他同期的改革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時代所給予他們的限制。」⁴ 這種批評也許沒錯，但卻未必公允。人為時代和環境產物，視野和行為自然受上述條件限制。能夠超越環境，走在時代之前者又有幾人？西方學者嘉爾拿（Ernest Gellner）在討論理性和文化的關係時所提出的觀點，揭視了我們對進步的迷思。嘉爾拿指出十八世紀以來，理性主義和反傳統主義被視為進步的主要動力。理性和個人主義卻又息息相關。有效行使理性，必須獨立自主，不追隨群眾路線和既定的文化價值，否則只會停滯不前。在啟蒙先導者的眼中，文化、歷史以至群體生活都是進步的阻礙。⁵ 這種觀點在過去兩個世紀影響甚大。自五四運動以來，先進中國知識分子受啟蒙思想影響，往往視反傳統主義、理性主義和文化與社會批判為進步的動力。他們固然看輕種種教條和成規，就是在既有秩序之中努力不懈的人，也未必獲得他們肯定。丁日昌一直沒有較先進的思想，其施政方針傾向在體制以內改革，所以容易被人評為「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時代所給予他們的限制」。

呂實強所著《丁日昌與自強運動》，出版於1972年，書中嘗試指出丁日昌思想的前瞻性。書中〈緒論〉特別強調「丁氏畢生言論中，有一項極為卓越的見解，即為對變局之認識與適應」，並指出當時士大夫之中，知時代巨變已臨者不少，但能「深入研究，提出有效的應變方策」者，僅

3 參考《丁日昌研究》一書收納的各篇文章。

4 丁日昌著《丁禹生政書》（香港：丁新豹，1987），代序。

5 Ernest Gellner, *Reason and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1992), chapter 1.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等而已。⁶「其中李、丁之感覺尤為敏銳，態度更為積極。……而丁氏之議論，尤其深刻痛切，最具積極發展傾向。就應變之具體方案而言，丁亦較李為突出。」⁷書中既將丁氏的視野提高到和一眾洋務領袖之高度，更大力表揚丁日昌實幹的功勞。事實上，丁日昌官位不如曾、李、左一眾，其出身亦端賴曾、李提拔，不難想像他為官二十年間，一直跟隨曾、李主導的改革，並且負擔起實務的工作。另一方面，丁日昌雖亦出身舊學，但早年科舉路途不順。1842年中秀才後，一直未能更上一層樓。只能憑守護潮州，力抗太平軍之功而踏上仕途。也可能因為丁日昌未如曾國藩、李鴻章一眾，以進士出身入翰林院，再逐步攀升，故他比較少關注章辭之學，也沒有發展出嚴格的思想系統。就是在改革問題上，他也沒有陷入「體用」的論爭中。所以我們看到的丁日昌確是一個實幹者。

當然，傳統儒家的精神仍是丁日昌的一大動力，在嘉慶時期重顯光芒的「經世」學說，更鼓勵他投入重建社會和政治的工作。不過如張灝教授所說，晚清「經世」之說，相當宋明儒所謂的「治法」，內容大部分是有關官僚制度的業務性和技術性問題，如吏治、賦役、鹽運、河工和水利等。⁸他的說法在美國歷史家歐中坦（Jonathan K. Ocko）遙相呼應。歐中坦眼中的丁日昌，有別於因循保守的一般官吏。在西力日侵，中國境況極為艱險之時，丁日昌採取中庸（moderate）的路線，意圖改革中國的弊病，卻又未激進至要放棄中國的傳統。⁹因此，在他為官二十多年間，他致

6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臺北：中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頁345。

7 同上，頁346。

8 轉引自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 1861-1900》（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42。

9 Jonathan K. Ocko, *Bureaucratic Reform in Provincial China. Ting Jih-Chang in Restoration Kiangsu, 1867-18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3-4.